

抗戰中的政治問題

——徐特立先生論文集——



新知書店總經理

抗戰中的政治問題

——徐特立先生論文集——

新知書店代售

抗戰中的政治問題

•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•

著者 徐 特 立
出版者 播 種 社

新 知 書 店 代 售 處

漢口江漢路聯保里

全國各大書店

廣州 南陽 衡陽 常德 麗水 襄陽 分 店

特約經售 讀書 馬 活 生 社 店

◆ 版權所有 • 不准翻印 ◆

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戰時政治問題目錄

徐特立著

自序——抗戰給我的機會

一、政黨與政府

二、目前政治形勢與今後抗戰的任務

三、抗戰到底與自力更生

四、國共合作與抗戰前途

五、淞滬抗戰的教訓與國共合作

六、怎樣訓練戰時工作的幹部

七、加緊農村工作是戰勝之最大保證

八、關於武裝農民問題

九、游擊戰爭在持久抗戰中的各種基本政策

十、駁斥漢奸對於中蘇關係的破壞

十一、論反托派鬥爭

十二、關於矛盾統一的幾個要點

抗戰給我的機會（代序）

特立在過去是一個澈頭澈尾標本式的教育救國論者，從民國十四年到十六年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過程中，被革命潮流粉碎了我教育救國的理論。但從十九歲一直到六十二歲都是以教書爲職業，教育爲事業。因爲我是一個教育的實際工作者，所以只有教育的事業；而沒有具體的，關於教育理論或意見的著述這一類的成績。至於對政治發表言論，那只是近三個月的話，就是從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起，直到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止，一百日間的政治言論，登載於報紙和雜誌的，不過百分之五十。其實我是一個極不愛寫文章的人；一生寫文章只有兩次：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前一年，寫了半年的教育論文，登載周南教育雜誌上，這雜誌是我發起的，文章就是我和周南的同事以及學生寫的。我自己校對，自己發

行，自己籌款。這時我任周南的校長，兼教員，每一天上課總是五點鐘左右，全校中有中學，師範，及小學，學生三百餘人，公家津貼，每年紋銀四百兩，我和校中一切教員都是平等薪俸制，每人每月十元正。當着辛亥革命的前夜，我的文章就被反動勢力壓榨出來了，而學校的艱難，和家中的困難，以及建立該校的主人朱劍凡先生毀家興學，該校教職員的薪俸不足養家等等，都是我寫文章的刺激物。我對於教育的得有一知半解，還是辛亥革命前夜的環境給我的。這時正是我一鳴驚人的時期，但是不過經過了半年，辛亥革命成功，我也寂若寒蟬了。

大革命失敗後，在亡命過程中，我的政見沒有機會發洩。以後到了新的政治環境，自以爲國家有前途，頗足自慰，不能引起我的情感。自民國二十年一月起，到二十六年十一月止，我都是負的教育行政責任；但六年間，只發出一個訓令，對於各縣教育的指示，其餘全用書信。因爲我只是一個實際工作者，不是理論家，作家，政治家，或教育家，而只是一個老教書匠，和教育行政負責者，身教

主義者罷了。至於發表言論，就非在革命大轉變過程中，不能引起我的興趣。最近三個月，我離陝北來到長沙，正是上海失陷以後，南京行將失陷的時候，國家存亡，擺在國人面前，以致人心空前的浮動，也正是敵人的政治進攻，最有利的時期，而長沙又是政治進攻的主要目標之一，因此與我接見的同胞，日以百計，至少也以數十計，其中愛國的志士，却把我當作了預言家，而政治間諜也就把我當做了他進攻的目標。因為我不是以個人的資格來湘，而是八路軍的代表兼是共產主義者，所以測量我的態度者，也紛至沓來。我也正坐在狂風巨浪飄泊的舟中，而把舵者十分感覺把握的困難，逼得我不能不發表言論，不能不寫文章，所以只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寫了超過有生以來十倍以上的文章。因為革命空前的發展，幫助了我個人空前的發展，一切都是時代的產物，我當然也不會例外。在革命工作中的發展速率，一月可抵十年，並且祖宗歷史上所沒有遇到的機會，現在都可遇着，只要自己不消極不坐失機會。目前整個中國社會便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和

軍事的學校，一切採人教已復興建國的大道理，也隨着這一廣大無邊的學校而發展起來。

我的言論底內容和材料，是革命的環境給予我的，同時我的分析方法也是革命的環境給我的，我自己是本來無一物，雖然不免有些過去的成見，但因環境不許可也大部分粉碎了。大概可以相對的估計『客觀戰勝了主觀』，這是第一。在十分複雜的環境中使我手忙足亂，不能到處應付，平均看待，因此必須放棄大部分瑣屑的工作，只抓住工作中心的一環。所以我的言論雖然有數萬言，其中不免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，但可以相信沒有違反大的原則和基本的理論，這是第二。與我接觸的人們在每一問題上都有相反的言論，同時還有調和派折衷主義者，也難免不有漢奸，門戶洞開，來者不拒，甚至姓名住址我都不知。縱談政治，不問來意，因此衝破了過去一切狹隘的觀點，使我的思想不能不成爲全面的，非片面的，這是第三。因爲我是八路軍的代表和共產黨人，在政治上不免有被人們誤會的

地方，因此我採取絕對公開的辦法，言論和行動絕對一致，對任何人無論相識不相識的，總是一套話。言論有系統，萬變不離其宗，這是第四。就我所處的環境是異常複雜的，有和我談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，有和我談政治形勢和政治工作的，也有和我只談人的問題的。但我的態度只問事不問人，因為人的好壞是政治環境造成的，不是根本問題，主要的是談政治形勢和工作，因為政治制度是更根本的問題。爲着急則治標，所以多談目前的問題少談及較遠的根本問題，這是第五。有不少的人們誤解，以爲政治就是陰謀，還以爲環境是可以由人的意志決定的，竟至有人以爲政治家等於宗教家，是爲信條盡力。但我所發表的言論大部分是估計最近的將來，如常蔣委員長未發表抗戰到底的宣言以前，就估計中日問題的前途是戰而不是和，當着敵人深入晉南時就估計整個戰爭是勝而不是敗，因此我的言論就帶預言性質，不是陰謀，也不是背誦宗教的信條，言論對或不對，目前可拿事實來證明。我們研究學術，用來說明過去，不如用來估計將來，更有利

於檢驗自己的言論是否正確，這是第六。近三月來我所發表的言論既已登載在報紙和雜誌，本無重印的必要；因應付友人之請，及存稿以備自己檢查，於是允友人之請付印。

徐特立於長沙

一九三八，三，三十一日。

政黨與政府

政黨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，第一是政治上的領導，第二是組織上的領導。前者的任務，第一是政治理論的建立，第二是政綱的製定，第三是政策的決定，第四是正確領導方式的確立。牠應當因此而得到羣衆團體和政府深刻的認識和自動的執行，而不含任何的強迫與命令，這便是平常所說的黨的領導權。黨是沒有強迫執行命令的權力的，所以牠沒有武裝，沒有監獄，也沒有法律上的制裁；牠本身不是一個權力機關，只能靠牠的黨員在政府機關中，羣衆團體中普遍的發生核心作用。

政黨的每個黨員都應該忠實於國家，忠實於民族，忠實於黨的政綱和政策的執行，在羣衆中成爲一個最前進的模範人物，然後能在羣衆中建立自我的信仰，建立黨的威信，然後能使羣衆團聚於黨的周圍，這就是所謂「起核心作用」。但

這裏並不是用拉夫式強迫羣衆擁護黨，羣衆擁護黨是出於他們的內心作用。因此，我們領導羣衆是要靠政綱政策的正確，在事實上要成爲廣大羣衆生活意識所反映的要求。黨在羣衆的意識中要能夠使羣衆認爲黨是民族的，國家的及自己的救星，這才是真正的領導權。

至於普通所謂爭領導權並不是爭取政權，而是爭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綱政策的實現。所謂「以黨治國」並不是用黨來代替議會，也不是以黨來代替政府，包辦一切政治，成爲黨的專政。把領導作用與政權混合起來，這在實際上便等於取消了黨。

其次，黨的領導作用不單純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張去取得羣衆的接受，却是經過各種組織而使牠實現起來。因此，除經過黨的本身的核心組織之外，還要經過政府的組織（當權的黨）及各種羣衆團體的組織去實現自己的主張。假若政府的組織及羣衆團體的組織不健全，雖然有黨的組織，也就徒然成爲一個空洞的東西

。所以我們要建立強有力的國家，在組織方面必須有政府，政黨及羣衆團體三種組織。

黨的任務是在領導；政府的任務是在行政，司法和立法；羣衆團體的任務是在使羣衆自治。三者的任務各有差別和範圍，而且互相聯系着，缺一不可，兩兩侵犯也不可。政府有強迫作用，拿孔子的話來說，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」即是政府的強迫作用；而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，深入羣衆的內心，却是今日政黨的作用。在政府有上下級官階之分，對於羣衆有官民之分，這裏便含着名分的差別。可是在黨內，一切黨員都是同志，無所謂官階，也無所謂名分，更無所謂同鄉和同姓，一致統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張下，沒有任何猜疑，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說服：就是黨內的處罰也只有勸告與警告，到了開除黨籍已是無以復加了，同時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黨。因為黨不是權力機關，而只是領導機關，用通俗的話來說，假若我們認為政府是父親的話，那末，黨却便是母親。

黨的專政只能說是黨的政治主張透過政府而達到實現，並不是用黨來代替政府執行政權。而透過政府也是由自己的黨員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，而不是黨對政府下命令和強迫政府執行。更不是政黨駕乎政府之上，而是各別的獨立機關，各有各的上下級關係。即黨被羣衆和政府所推重，也不是認為黨是他們的上級，在組織應該服從，而是爲着黨綱及政策的正確，是一種救國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張，同時黨員也是羣衆所推崇的模範；因此黨的『黨德』和黨的政綱不是在羣衆和政府機關之上。倘若認爲『黨』是組織上在羣衆和政府之上，那就必然會走到強迫羣衆和命令羣衆的路上去，而使一個國家形成兩重政府的形態。如果黨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，則成爲屋上架屋；如果黨的命令與政府的命令是歧異的，則羣衆無所適從。故此政黨必須集中精神於分析國際國內形勢，而決定正確的政綱和政策；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，而替代政府執行一切政務。

政黨以政治爲牠的生命，每一個時期的政治轉變，必須竭盡全力發動全黨來

迎接這一轉變，把國家社會乃至把整個國際轉危爲安。在這種嚴重潮流之中，若一個政黨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，那麼牠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，誰也不願意推翻牠，同時也就不能推翻牠，而且還會擁護牠。因此，稍有歷史的政黨，不會把爭權奪利去代替救國救民的任務，也不會把黨的專政看做是黨的權利，而不看做是黨的義務。如果以爭權利來代替專政，那麼，就會使黨員變成黨官，政治家變爲政客，政黨變爲政客的集團。專政的意義弄錯了，結果國家遭到滅亡，自己的黨也會被敵人毀滅。同時一切政黨都應擁護自己階級的利益，但是只見近利而不見遠利，及祇見狹隘的階級利益而忽視朋友的利益，也是嚴重的錯誤。尤其是在以黨專政的口號下，變爲以黨專利，更爲嚴重。因爲他不顧到朋友的利益，就得不到朋友的幫助，孤軍獨戰，結果就變爲此路不通。例如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，馬克思是他們的老祖宗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：『共產黨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利益上』。同時另一處地方又說：『共產黨主張廢止私有財產，而不是廢止小

農民的財產和小職工的財產」。列賓也是共產黨的首領，他認為農民大眾和殖民地國家都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，殖民地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利益，間接就等於無產階級本身的利益。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，在帝國主義進攻時，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熱中，如果離開了整個民族的利益，而只站在狹隘的階級利益上，使得國家滅亡，而自己的階級也會同歸於盡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還不愛惜朋友，幫助朋友，以致犧牲了朋友的利益，結果犧牲了整個民族利益，也就是等於犧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。目前法國及中國的天主教也和共產黨合作，因為他們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敵人是世界的侵略陣線，威脅了一切人類。這並不是說，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絕對相等，但是在一定範圍內，共同的利益是絕對相等的。因為政黨自己本身不是等於朋友，所以不能和朋友合併為一黨，也不能夠隨便拉朋友進自己的黨裏來。

黨的專政是保證政綱政策的實現，而實現的是大多數的朋友，却不是單純的